

思想者小传



乔尔·莫基尔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

# 理解创新，先要读懂“思想市场”

——乔尔·莫基尔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

## 供给侧：激励机制决定创新的产生

“思想市场”是创新产生、筛选与传播的组织方式。不同于传统市场以价格为核心、通过供需关系实现市场出清的运作机制，“思想市场”中的交易主要通过“说服他人接受观点”来实现。当一个新的理论、发现或观念被他人认可时，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销售”。这种交易形式决定了，“思想市场”更接近一种以影响力为核心的交换体系。

且可以被无限复制与共享。因此，思想的创造者往往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充分回报，而更多依赖非货币性激励，如声誉、地位与学术影响力。

度、优先权确认等。这些制度并不一定赋予思想排他性的产权，但能够确保思想创造者获得归属感与声誉回报，从而维持创新动力。同时，思想传播也常受到既有权威、利益结构与制度环境的约束，形成对知识的垄断与扩散阻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新思想的接受与推广。

制，可将有用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导“如何做”的规范性知识，另一类是解释“为何如此”的命题性知识。两类知识的激励机制有很大不同。

性排他收益，例如通过技术保密维持垄断地位，或依靠先发优势在市场中率先获利。

对于命题性知识，由于其难以专利化，也难以直接变现，故更多依赖非市场激励。具体而言，这类知识的激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资助，即政府、机构或个人提供的资金支持；二是声誉与同行尊重；三是内在动机，即对探索与求知本身的热情；四是宗教或信念，这在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五是利他主义，即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这些非货币激励共同支撑了命题性知识的持续供给。

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创新如何产生并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已成为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持续产生创新，而另一些社会则在既有知识的边界内反复徘徊？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资源禀赋或技术积累本身，而在于知识如何被创造、如何被评判，以及如何如何在社会中扩散。换言之，创新的核心不只是“发明”的瞬间，而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过程：思想在何种制度与文化环境中出现，又在何种机制下被接受或被淘汰。

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将创新理解为发生在一个“思想市场”中的活动。在这个市场中，知识并非简单地被生产出来，而是需要通过竞争与说服获得认同；新的观念既可能被迅速传播，也可能因缺乏需求或制度支持而沉寂。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筛选与扩散过程中，有用知识得以累积，并最终转化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力量。

因此，理解创新，首先需要读懂“思想市场”本身：它如何激励知识的供给，如何塑造对思想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其运行机制与制度约束影响知识的传播与筛选。从更深层次看，创新不仅依赖于制度安排，还取决于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协调一致，而这种关系正是“思想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制度可以理解为一套正式规则与激励机制，而文化则由信念、价值观与知识体系构成。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共同作用的关系。

“思想市场”不仅由供给侧的激励驱动，也依赖于社会对创新思想的持续需求。

对思想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对知识与解释的渴望。在人类社会，人们始终需要理解自然世界、社会秩序与技术变革，因此会主动寻求新的理论与观念来解释现实。无论是科学问题、哲学命题，还是制度与政策问题，这种认知需求构成了“思想市场”最基础的需求来源。

以近代欧洲为例，不仅知识生产者对新观念充满好奇，知识消费者——包括学者、公众以及精英阶层——同样对新的思想表现出强烈需求。同时，权贵与富裕阶层通过社交与资助等方式主动接近创新者，进一步强化了对思想与创新的需求。

“思想市场”的运行效率关键在于交易成本，其中最核心的是访问成本。所谓“访问成本”，是指获取、理解与验证知识所需付出的成本，包括信息的搜索、储存、跨语言理解以及真伪辨别等。这些成本直接影响“思想市场”的效率：若获取与理解知识的成本过高，思想便难以传播与接受。

访问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技术条件所决定。历史上，印刷术的出现显著降低了知识复制与传播成本，随后，邮政体系效率的提升，使知识分子能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另外，通过字母排序与百科全书等方式组织知识，使其更易检索与使用。例如18世纪的百科全书，在功能上相当于早期的“搜索引擎”，极大提升了知识获取效率。这些技术进步推动了“有用知识”的扩散，从而促进了经济与技术发展。当解释“为什么”的命题性知识与“如何做”的规范性知识相结合时，创新便由此产生。

当访问成本降低后，人们就可以构建信任机制以促进思想更大规模的传播。即使未亲自参与实验的人，也可以基于这些制度化的见证与记录，接受实验结论。由此，知识不再只是个体判断的结果，而成为一种被集体认证的公共成果。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专家、科学界的共识，以及被社会认可的权威的信任。然而，这种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约定，往往会受到质疑甚至被削弱，一旦信任被动摇，访问成本也随之上升。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欧在发展路径上逐渐出现“大分流”。古代中国虽拥有发达的出版体系与活跃的知识生产，并涌现出沈括、苏颂等杰出学者，但其“思想市场”受到较强制度的约束；相比之下，欧洲在制度竞争与人员流动方面更为开放，思想家可以跨国迁移，从而更

求，使“创新偏好”成为由文化风尚与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下，人们更愿意接触新的思想，从而形成更强的需求。

在制度层面，大量成功的思想生产者进入知识生产体系，反映出社会对知识与创新的高度重视。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对传统权威的系统性怀疑。比如，大约从1450年起，欧洲社会在医学、天文、地理、物理与数学等领域逐渐质疑古典权威所确立的知识体系。随着对传统信任的削弱，社会

## 运行效率：访问成本的降低促进创新

取效率。这些技术进步推动了“有用知识”的扩散，从而促进了经济与技术发展。当解释“为什么”的命题性知识与“如何做”的规范性知识相结合时，创新便由此产生。

当访问成本降低后，人们就可以构建信任机制以促进思想更大规模的传播。即使未亲自参与实验的人，也可以基于这些制度化的见证与记录，接受实验结论。由此，知识不再只是个体判断的结果，而成为一种被集体认证的公共成果。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专家、科学界的共识，以及被社会认可的权威的信任。然而，这种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约定，往往会受到质疑甚至被削弱，一旦信任被动摇，访问成本也随之上升。

## 动态演化：科学技术的互动造就创新循环

论的发展推动了新技术的产生，而技术工具（如实验仪器）的进步又使科学家能够观察到此前无法触及的现象，从而推动新的科学发现。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创新不断累积并加速发展。

创新的持续产生取决于支持知识创造的制度环境。要产生新的有用知识，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四个关键条件：

对更准确、更有用的新知识的需求迅速上升，推动“思想市场”由“继承经典”转向“追求创新”，并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动力。同时，新的思想并非完全推翻原有知识，而是建立在既有知识基础上，需求也会随着知识积累而不断升级。科学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问题，使得对更高层次知识的需求不断产生。

与此同时，需求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在近代欧洲，“思想市场”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贵族或赞助人，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知识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医生、工

程师、炼金术士和实用数学家等。他们通过购书、通信以及参与学术社团、科学院、咖啡馆和公共讲座等“公共科学”空间，积极参与思想的传播与消费，从而形成跨地域、跨职业的知识网络。这种知识网络使得一个思想一旦被一部分人接受，就容易被更多人关注和讨论，从而扩大需求规模。

这种需求不仅表现为对思想本身的兴趣，更体现在对其实际应用价值的期待。社会普遍相信，“有用知识”能够改善现实世界，尤其是在生产与技术层面。掌握科学知识和实践

容易孕育出突破性创新。

进入现代，访问成本极大降低，“思想市场”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学术论文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其标准化结构（模型、数据与实证检验）显著提升了交流效率。同时，全球科研产出持续增长，表明供给侧激励依然强劲，而社会对有用知识的需求依然保持稳定。

与古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约束不同，当前中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创新激励体系，并且政府对科研与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与此同时，

绝对“知识权威”。理念通过竞争与说服被筛选，从而实现知识的优化与进步。

第三，需要知识与人才的自由流动。富有创造力的个体能够跨区域流动，进入最有利于其发挥潜力的环境，从而提升整体创新效率。

第四，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政府。政府既不能过度干预创新方向，也

技能的人，被认为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在“思想市场”中，这些知识生产者同时也是供给者，而需求方则包括改良型地主和创新型工业家，他们愿意为能够提升生产力的思想与技术付费。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现象是18世纪“技术顾问”的兴起。具备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人开始以咨询形式参与经济活动，标志着思想与技术开始更直接地与市场需求对接。同时，需求方不仅是被动接受者，更是积极的评判者。他们通过阅读、讨论、实验与验证，对不同思想进行比较与筛选，决定哪些观点能够被接受并传播。这一过程类似于市场中的“选择机制”，决定了哪些思想能够“卖出去”，从而在市场中存活下来。

近年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科技成果的快速发展与显著进步。

然而，当代“思想市场”也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存储与搜索成本大幅下降，但信息验证与筛选成本却不断上升。虚假信息“伪装”更易传播，个人辨别真伪的难度增加，使访问成本以新的形式出现回升。此外，信息过载问题日益突出，也使人们难以及时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总体而言，“思想市场”的运行效率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知识获取成本、信息甄别能力以及制度环境对创新的约束与激励。在技术进步与信息泛滥并存的背景下，“思想市场”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不能完全缺位，而应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通过提供制度保障与基础支持来促进创新活动的发展。

上述这些制度条件共同构成了创新得以持续产生的基础环境。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是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但其效果取决于制度约束。在良好的制度框架下，竞争能够激发创新活力；而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中，竞争则可能转化为破坏性力量。当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在“促进竞争”与“防止冲突”之间实现平衡。（整理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刁文天）

### 解 秋 日 报 连载广告

####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

#### “集装箱”与“三明治”

在重庆，费正清除了从报刊上了解各种新闻，还留意利用各种机会直接去感受民众的情绪和政治倾向，经常在闹市区参加完各种社交活动后有意徒步回大使馆，穿大街过小巷，多视角观察社会。当时的重庆，好天气就是坏天气，坏天气就是好天气，天气越坏越安全——空袭少。每遇阴云密布、浓雾弥天，市中心的闹市里，菜馆酒楼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酒令猜拳声声，连电影院里的音乐也时隐时现，款款飘来。那时的电影数量少，甚至还放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录片，且反复放映。中国的故事片有《保家乡》《东亚之光》《塞上风云》《中华儿女》《木兰从军》等，外国片有《人猿泰山》《翠堤春晓》《出水芙蓉》《马革裹尸》等。

一天，杨刚要把一份新闻稿交给费正清，约在闹市见面，他们边走边谈，忽然费正清好像瞥见了前面有什么东西，说了声：“别动，站在这里，我就来。”杨刚警惕地留意着四面的动静，未见异常。她见费正清大步流星地追进前面的小巷子里去，过了一会才出来，喃喃自语道：“我又看到‘银狐’了，难道他们搬到重庆来了？”杨刚瞪大眼，莫名其妙。

费正清忙解释说：“‘银狐’是只狗，是昆明联大教师聚居的龙头村跟冯友兰教授同住一座庙里的犹太老夫妇养的。那对犹太人是德国人，他们的经历没人知道。联大教师们谁都不敢去问，因为从虐待恐怖中逃脱出来的人，哪个没有惨痛的事？老人在龙头村跟联大教师相处得很好，他们都是逃难者，只是他们是从欧洲来的，联大教师是从中国东部来的，同病相怜。跟随犹太夫



## 中国情缘

###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陈宇 著

妇一起来的只有那只北欧犬‘银狐’。它浑身毛色雪白，尾巴大而蓬松，机灵乖巧。它曾在深夜里帮助邻居找到在野外迷路的孩子。它还会当信差，衔着主人写的字条送到熟人那里。它时时刻刻陪伴在主人身边，多少减轻了主人在异国他乡的孤独与凄楚。”

杨刚听罢感叹道：“动物通人性，不会自我标榜，但人类丧失人性，却还会发明一套理论自我美化。希特勒大肆鼓吹大日耳曼主义，把不同民族分为什么高等种族、低等种族，认为日耳曼人最优秀，犹太人是劣等种族等；主张人类血统的纯洁和优生，还要改良人种，淘汰劣种；主张把所有日耳曼人居住地合并于德国。于是，侵略他国和掠夺犹太人被说成了保卫人类优秀文明的行为。当犹太难民酿成世界性问题时，为解决这个问题召开了埃维昂国际会议，但与会的三十二个国家迫于希特勒的淫威和各国自身的利益，却无法形成一个对希特勒进行谴责的决议，许多国家也不太愿意接受犹太难民。这个会议的绥靖色彩，使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更加肆无忌惮。跑到中国东北和上海的犹太难民就

有几万人，这是人类的耻辱啊！”费正清边听边不住地点头。

在跟杨刚的接触中，费正清了解到，杨刚渴望有机会到国外学习和扩大视野，于是就着手帮她争取一份美国奖学金。促成此事的还有两个好心人：一个是费正清在外交界工作的密友司普劳斯，另一个是燕京大学美籍女教授曹贵思。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跟杨刚关系犹如母女。杨刚参加革命工作无暇照顾年幼的女儿，就把女儿寄养在包贵思那里。

还有一个乐见此事成功的人是《大公报》总经理胡霖，他在美国很快就会有一个能干的特派记者了。由于他的疏通，杨刚得到了护照。当然，这些人未必知道，周恩来暗地里给了杨刚一个特殊的任务——到美国做国际统战工作。1944年，杨刚获得了拉德克利夫奖学金，去了美国。在那里，她一边读书，一边写文章，向美国朝野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在大洋彼岸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费正清结识的另一位共产党员记者是龚澎。

跟杨刚相比，龚澎的身份明确而公开，她是重庆周公馆里的人。那是曾家岩50号，是国民党当局“配给”周恩来的宅第，故以“公馆”相称。周恩来和他的工作人员就住在里面。一层与三层才是我方人员的住，中间那层则是国民党的人住的。中层房子还有突出于外的建筑构件，朝上、朝下，四面都可以监视共产党的行动。里面有国民党的政工人员，他们总在盯梢出入的人员。周公馆也是周恩来接见中外记者与宾客的地方，费正清曾作为外交官应邀到那里做客。他是历史学家，有一种对访问对象和环境进行详尽实录的职业习惯与癖好。他把濒临嘉陵江边拥挤逼仄的周公馆形容为“集装箱”与“三明治”。他这样记述：

你必须知道周公馆具有一种独特的组合方式，它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交错组成的三明治。首先，这儿有两进宅院，国民党特务占前院，共产党人居住在内院。其次，两进宅院中间是一幢三层主楼，共产党人住一层和三层，国民党特务就住在上下两层之间的二层。再次，还有两个更加亲昵的特色环境：环绕着共产党人所住的内院，一边是这幢三层楼，另一边是两幢二层楼，剩下的那一边，即临悬崖的那一边则是剩下一个大阳台，俯瞰着200英尺下的嘉陵江。住在主楼二层的国民党特务，可以从他们所住的二层里走到内院两边的二层楼上去，并可以一直走到阳台上去，站在共产党工作人员所住的房间与阳台之间张望、溜达。

总之，从费正清的记述中可以明显看到，国民党方面凭借其安排住房的权力，利用楼层高下、朝向以及视线的方便，把特务住房安排在有利的方位上，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监视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

(三十一) 连载